

略安全压力虽有所减缓,但国内维稳和政治挑战却无形增大。这恐怕正是美国所期望看到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会轻易在利比亚重启战端。不仅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不具备,利比亚还找不出像样的代理人,而且因为利比亚无论在石油还是在安全上均不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挑战,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所谓“人道主义”灾难,既然容忍其在苏丹达尔富尔大规模上演,对利比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何妨?何况美国已成功将大国拉进制裁卡扎菲的行列,将美国的敌人变成全球公敌,政治收益可谓不薄。草率动武,岂不白白断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如何评估中东变局的利弊?从中东视角看,此轮变局攸关全球油价,影响地区稳定,各国莫不深受其害。但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更高、对该地区投资更大的中国而言,短期内挑战似乎大于机遇;从阿拉伯视角看,此轮变局可视为阿拉伯世界又一轮政治觉

醒,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化诉求与反西方反美国的伊斯兰化色彩相互交融,无疑给国际政治多极化注入活力,这一点对中国倒不失为机遇;从非洲视角看,苏丹、突尼斯、埃及松动整个北非地缘板块,并对黑非洲造成冲击效应,其对中国在非洲长期形成的政治资源和近年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不啻构成新挑战。由是观之,中东变局对中国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更重要的是,能够实实在在抓住并转化为战略利益的机遇才是真机遇,否则就是假机遇。中国是否具备能力和战略准备去抓机遇?这是问题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应对给人的启示在于,或许中东变局对其全球战略布局和中东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冲击,但如果善加利用,巧妙应对,化危为机,则未必不会重塑中东格局。而这似乎正是奥巴马、克林顿、盖茨们所思、所想、所为的。○

中东动荡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到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放弃权力,政局动荡正在冲击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利比亚的卡扎菲恐怕难以逃脱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命运。目前看,中东动荡的冲击波进入尾声,但中东政治已出现颠覆性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未来10-15年,中东将会一直挣扎于如何重建被打碎的政治权威、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中东动荡究竟将对世界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以下几方面影响已初见端倪。

首先,不管中东动荡在阿拉伯国家中有如何不同的表现和进展,但其本质是中东草根阶层为主导的革命性群众运动,其根源是中东地区普遍的公民意识与人民主人意识的觉醒,其政治诉求是对现政权的不妥协对抗,其目的是通过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体制来实现政权与秩序重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阿拉伯世界开始融入世界民主的重要开端。

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爆发了三场历史性革命。第一场是1952年埃及前领导人纳赛尔所领导的“纳赛尔革命”,其目的是实现中东地区从前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束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979年伊朗爆发了“霍梅尼革命”,其目的是通过恢复伊斯兰宗教的政治影响力,反抗当时西方势力对中东的大规模渗透和对石油等伊朗国家资源的控制。2011年的中东动荡是一场中东民众自发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长达数十年的“强人政治”,反抗家族统治和少数统治精英对国家财富的垄断。在二战后世界所出现的“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阿拉伯国家始终置身事外。阿拉伯国家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绝缘似乎是铁律,但2

月11日埃及革命的成功意味着这一铁律已经被打破。拥有古老历史、阿拉伯人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埃及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并将开始向阿拉伯世界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过渡。单这一点,就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埃及革命并不是孤立的。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突尼斯在2011年1月所爆发的动荡,驱逐了本·阿里总统;目前的群众革命还在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蔓延。埃及革命的成功,究竟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传统君主集权或者强人专制的阿拉伯世界,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埃及革命将把世界穆斯林推上全球“第四波民主化”进程。

1993年,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世界各主要历史文明区域将成为未来冲突的来源,其理由之一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世界无法融入世界主流的文明进程。然而,中东动荡宣告中东阿拉伯国家开始走出宗教和传统束缚,由人民的意志来书写历史新篇章。在中东动荡面前,“文明冲突论”已经失去了其实证基础。

其次,中东动荡是中东地区和穆斯林势力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觉醒,其世界政治的含义虽然无法比拟1991年冷战的结束,但其影响显然将超越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超越中东,注定将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新的标志性事件。

全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约有12亿,分布在52个国家。这其中并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埃及是全球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埃及革命所引发的阿拉伯民主进程不断深化,全球穆斯林世界中若干有代表性的民主国家或许也将从此迈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

图将重新改写。从这两个意义上说,“埃及革命”最终的世界历史意义,可能并不取决于2月11日开罗街头胜利的埃及人喜笑颜开的欢悦,而是取决于未来的埃及、未来的阿拉伯世界能否真正跻身世界主流浪潮,将民主进步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达、社会富裕的甜美酒浆。

第三,中东地区可以预见到的持续动荡将给欧美在中东的原有战略利益和战略架构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持续高油价、加速流出的北非和西亚难民、未来以巴和平的新形势以及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等不确定性,有可能不仅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大全球通胀压力,也可能迫使在中东地区占据战略主导地位的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中东战略,修改其中东战略的传统重点。

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动荡中的应对策略可以说“调整迅速、务实面对”,从原来的支持穆巴拉克这样传统的亲美力量快速转向支持中东地区民众的政治诉求,抛弃和施压于卡扎菲政权,全力维护美国在中东保持驻军、同草根穆斯林势力和解以及中东第一区域外影响力大国地位等诸多关键性战略利益,以便尽可能减少中东动荡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危害。但未来中东局势究竟如何演化,目前尚难断定。如果美国未来能够影响埃及等国的政治重建进程,维持亲美势力的“基本盘”,那么中东动荡可能成为美国在“9·11事件”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中东战略利益重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新开始;如果埃及、突尼斯和中东地区未来政局更多地受到极端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社会动荡持续,那么中东格局的“重新洗牌”无疑将增加美战略包袱。○

中东剧变塑造“新中东”

唐志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这次中东剧变凸显“旧中东”已不可持续、大势已去,而“新中东”呼之欲出。之所以说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相对稳定的传统中东政治

局面被打破,中东进入一个变革与政局动荡的新历史周期。当前由突尼斯剧变所引发的“骨牌效应”仍在发酵、蔓延,几乎波及所有地区国家,整个中东